

主題 | 「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國際學術研討會—外省人遷臺及後七十年

時間 | 2019 年 11 月 29 日-30 日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B1 會議廳成功校區

主持人 | 張茂桂

發表人 | 高格孚、趙慶華、林傳凱

評論人 | 張茂桂、王健文、許文堂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協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婦女與研究中心

張茂桂：我們談的主題是「外省人」遷台及其後七十年，相對比較廣泛，有三位非常傑出的學者來和大家分享他們的研究。評論人，許文堂教授也是我認識快五十年，還有王健文教授是今天的評論人。我們這三篇文章有一篇是提認同變遷的高格孚教授，另外有兩篇文章是要探討第一代的外省人，他們在台灣的歷史經歷。首先就邀請高格孚教授來跟我們分享外省人第三代王師認同對話的研究，他來台灣也很多年，中文聽說讀寫都非常強，現在是法國里昂政治學院政治學的副教授，他的研究也是我平常必讀的關於認同研究的作品。

高格孚：今天要跟你們介紹 2015 年開始進行一份比較特別的研究，一個台北的第三代外省人的生命史。這份研究的領域還是以國家認同轉變過程為主，具體地講，這份研究試著針對兩岸關係與中國的「崛起」，怎樣影響那個人的認同模式。我今天的報告分成六個部分，先簡單地講生活史的研究方式、方法，再來是受訪者的背景，我會分享他怎麼描述從他小時候最早碰到的一些很驚訝的小事件，走出「溫室」。再來我會講他的父母跟他看中國的差異在哪，他看到紀錄片的時候有什麼感覺，那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然後我會再講他怎樣看中國，比較中國跟台灣。最後我會以生活方式跟他生小孩這兩個新的因素，怎麼樣影響他的認同。

先簡單地講生活史(life history)幾個重要點，它特色就是我們只會選擇一個研究對象、取一個樣本。在這個篇幅裡，我講了我怎麼認識他。我當時看了《看見台灣》紀錄片，有打算寫一篇文章，所以我就去找負責這個宣傳工作的，我約他後，我們開始聊，開心到吃完的時候我們還沒開始討論《看見台灣》紀錄片，因為他覺得我很有意思，很想聽我自己的故事。當時我在法國剛出了一本關於國族在台灣認同祖先的書，他聽我講我的故事，後來我一邊講、慢慢理解他有可能也是外省人，最後我就決定讓他來講自己的故事。後來跟《看見台灣》完全沒關係，而且這篇文章也沒有寫。

我們見面幾次就決定訪問他，我就開始跟他討論、解釋生活史研究法是什麼。比如先把這個主題講好，主題就是國家認同，特別是他看了這部電影，為什麼是這麼大的震撼，會有什麼結果？王師第一次見面講了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事情，當時 2015 年台北市長跟市議員選舉已經結束幾個月，柯文哲已經當市長，然後王師非常藍，在他的周圍，沒有人投過非國民黨的候選人，所以他自己投票給柯文哲，自己已經覺得是很大的改變。我立刻問他，你明年一月總統你打算投給誰？我問他會不會投給蔡英文，他說很可能會。他投票給柯文哲，柯文哲不是民進黨，但是對他來講，投票給柯文哲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意義的決定。

所以我們訂的目的就是請他解釋這個轉變怎麼過來的，然後有什麼樣的結果？生活史的研究方式，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原則是，訪問的人要講清楚祖籍，要多問問題，不要評論，主要是讓這個人自己描述他的事情。最後一點蠻重要就是，這篇文章用的是我們第一次正式見面做這個訪問的內容，這篇文章引用王師的生活史，大概有 70~75% 的原文，差不多代表 70% 我

們當天的對話，他講的內容，第四頁試著描述他的家庭背景，我從這個章節開始引用他的話，前面我是解釋我的方法論，可是中間從這個章節開始都是引用他的話，我自己的評論沒有先放，我先用說的，等我們準備寫一篇文章，我會把稿放在裡面，目前這篇文章裡面，只是他自己的話。

第五跟第六頁是描述他從小學、國中跟高中開始碰到一些讓他很驚訝的情況，這些回憶可以幫助我們回到一個已經很久之前，他自己感觸的情況。透過他可以知道，這個族群的特別共同性裡面，有什麼樣對其他人概念與詮釋？他在上小學第一次聽到有人講台語，他的反應就是：這是什麼樣的語言？怎麼講另一個語言？他是大安區長大的，父母、阿公阿嬤、爺爺奶奶都是外省人。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到了小學不知道什麼是台灣人、本省人、外省人，不懂這些字，然後沒有聽到任何人講台語，所以提到「震撼」這個詞。

再來到了國中，聽到一個老師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這又是對他來講很奇怪的概念，他跟我說我沒辦法理解他講什麼，因為當時受到的家庭、學校給他的教育讓他無法理解。另外一個想法是傳統台灣的福佬人是比較沒有文化的，因為那個時候外省人的意識型態是主宰台灣社會的。他很勇敢地自己講出來，所以我覺得他的想法是很有價值的。他舉了另一個例子，有一次，代表民進黨的外省籍的候選人林正杰出來選市議員的時候，王師說他家裡有個阿姨感到非常不高興，阿姨以「數典忘祖」來形容這件事。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聽到陳水扁這個字就覺得不對勁，怎麼會有人把水跟扁放在一起，是一個非常不優雅的名字，就是沒有受到教育的家庭才會取這樣的名字。反正他就是慢慢發現新的一些事情，一直到高中，90年代中，認同開始變得蠻激動的。剛好那一年在台北舉辦了，「我不是中國人」，幾個禮拜後就有一個「我是中國人」遊行。他那時候是高中生，自己的政治意識很強，結果他卻跟著父母加入了新黨。為什麼進入新黨？就是外省人跟我們常常講的理由，就是覺得只有新黨才能代表我們這樣的外省人，還認為國民黨已經被李登輝污染、他是一個日本總統等等，所以那時候他已經有一種轉型的認同。

第六頁你們可以看到父母對中國的看法，這邊講了一個簡單的故事，他爸媽回去中國之後，回台灣一直讚美中國，一直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才是給我們中國驕傲的政見。他的媽媽的看法比較有點差別，他完全否定台灣又完全不管中國，是一個不同的認同模式。後來王師在台灣的電影看到紀錄片的時候，他說蠻令人感動的，也很震撼！「就是我們從小事實上真的經歷過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我們參與了那個投票的過程，投票投過市議員、立委，投過台北市長和總統，才看到台灣能夠從過去變到今天這個樣子有多不容易，有一群人有這麼大的一個犧牲，然而這群人和我們站在意識型態的對立面，變得好像我們才是錯的那一方，看這部電影時給我心理上很大的震撼，看完一直流眼淚。看那部電影以前，我看到田媽媽很反感，現在我很想去抱田媽媽。」

他這樣講他的故事，很感動，也開始重新建構很多想法、思想跟價值。這段描述是國中之後他去中國，在那邊看到什麼事情讓他很不舒服，回台灣的時候開始做比較，我覺得有意思的是他用什麼字來描述他看到什麼。我這邊用紅色，慢慢有個因素出來是因為生活方式，重新建構很多價值或做很多反省，碰到很多不同的事情都有觀念，是很深入的反省。比如要認同哪個地方，中國、台灣、亞洲都可以，怎麼樣去問這個問題。他回台灣之後就慢慢去學習，找到他現在的工作，就會讓他去台灣所有地方，他開始發現其實一個人終究要認同的是他長大的地方。

我最後問他，假設有一天中國侵略台灣你會有什麼反應？他說基本上他的答案是中國如果統一台灣，要先看他的做法，如果是暴力的方式，看我有沒有資源，如果有的話我立刻離開，沒有的話我就只能留在這裡，為什麼？因為我已經屬於這塊土地、認同台灣，這是我的國家。他也有小孩，生了小孩之後，想法也改變了，如果中國用的方法是比較和平、保留我們的生活方式，我會選擇留在這裡。等我小孩長大，他會有自己的看法。他不是不管中國人統治台灣，剛好相反，是因為他很認同台灣，除非中國真的是取消台灣的政治自由，不然他沒有任何理由會讓你覺得要離開台灣。不過他也很尊重他的父母，雖然價值觀不一樣，但他沒有批評父母，因為他很孝順。他會以一個現實主義的看法來判斷情況，他很重視台灣的民主機制，進行的過程就是放棄一個之前被意識形態或家庭教育、國家教育，所結構的一個認同模式，然後看事實作比較。

張茂桂： 接下來就邀請趙慶華博士，他是台灣文學館的研究員，他要講的題目是：那些三角臉、劉必稼與張拓蕪（們）：看見不被看見的「外省人」（按：最後報告題目是：那些三角臉、李師科與劉必稼（們）：看見不被看見的「外省人」）

趙慶華： 我自己在從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都是以外省人做研究的主題，碩士論文是做外省第二代女性作家的研究，博士論文是做外省第一代的知識女性。過去比較關注外省女性的議題，但最主要的關懷還是希望擴大大家對外省人的認識，這次我就選擇外省人的農民或我們概念中的老兵，但是題目有點改，張拓蕪不見了，加了李師科，我現在的題目是三角臉、李師科跟劉必稼，他們都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方式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可能有看見也可能視而不見的某一群外省人。

外省人有很多種，台灣社會上的氛圍對外省人的概念或是一種形象，還是隨國民政府逃難來台的人，在檯面上我們最常看到所謂黨國權貴、既得利益者，擁有政經文化、社會資源的這些人，他們聲音也很大，大家就會覺得外省人就是這群人。也可能因為他擁有的權力對台灣本省的群體形成一種壓迫，乃至過去長期，在政治上作為一個支配者，到 80 年代 90 年代以後，台灣民族主義意識興起的時候，這群又變成所謂要括號的「台灣人」、要對抗的對象。這是大部分大家很一致、整體去談外省人的時候，我們不太會意識到外省人當中其實有差別的，他們可能來自全中國各地，當初也有差別。再來，來台的外省人有世代的差別，有第一代、第二代，有民國初年出生的，也有 20、30 年出生的。我的父親來到台灣時，是他 12 歲的時候，跟著我的爺爺來，所以有世代的差異。也有階級的差別，有政經文化的社會高層、上層，也有中間的人士或底層的，有不同位置。最重要的就是有性別差異，我們在談外省人，其實外省人男性的圖像是被比較鮮明或者是比較多討論的，過去我大概關注在女性的部分。

這個論文的前面，一開始我做了一個提問，今年是 2019 年，所謂外省人遷台七十週年，可是在社會上沒有興起什麼漣漪。跟十年前的 2009 年做一個很明顯的對照，2009 年的時候因為是遷台一甲子，那年透過文學文本的呈現跟出版，引發非常多所謂外省人以及他們來台的關注。最重要的三本大概就是這邊列的，資深的作家王鼎鈞寫的《文學江湖》，他自己自傳四部曲的最後一部，寫他 1949 年來台到 1978 年移居美國的時間。王鼎鈞移居美國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台灣了，因為他不能坐飛機，所以他在這個《文學江湖》裡面寫外省人來到台灣，也寫他自己為什麼要遷居美國，這跟他自己白色恐怖等等的經驗有關。再來就大家很熟悉的齊邦媛老師的《巨流河》，這本書引起非常大的迴響，翻譯成日文、英文，也到中國出版，這本書的口號是 1949 遷台一甲子：最重要、最溫暖的時代紀實，寫他自己，也寫他的父親，他其實也想為同一代人說話。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是以外省第二代的身分跟立場去寫他的父母輩那一代人，裡面也訪問很多外省一代作家，像是管管等等。

這三位作家的知名度很高，也在文化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這樣的書出版以後，其實引發相當多迴響，這是外外省人生命記憶被公共化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基本上以 1949 年為座標書寫外省人在台灣六十年的經驗跟情感，剛剛寫的可能觸及到不同群體，透過共時性和歷時性的「記憶勞動分工」，既是寫小我、寫自己的歷史，其實也是寫大我，整個外省族群的歷史，為外省族群發聲。所以相對於當時，今年在公共場域裡面我們不太會聽到這樣的聲音，唯一跟我以及成大有些關係的是在台灣文學館舉辦了：逆旅·一九四九——臺灣戰後移民文學特展。從國家人家博物館移動到澎湖，現在在成大博物館展出，就是山東流亡學生跟澎湖七一三事件的七十週年特展。

另外一個很有趣單位是社團法人轉型正義協會，他們不是促轉會，是轉型正義的民間團體，他們舉辦了「中華民國在台灣 70 週年（1949-2019）」。這個活動他跟我一樣的好奇，1949 對於台灣來說，絕對是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可是我們今天卻出奇的缺乏討論！他的立場是比較相對的，他要談的是外省來到台灣對台灣比較負面的，包括威權、白色恐怖產生的影響。所以這樣的沈默我就會覺得為什麼？是大家已經覺得談得夠多了嗎？現今發生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或是大家更想要追究的，包括不管是香港反送中事件，或是選舉將屆，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响。所以比起討論在外省人七十年，可能大家就會很不高興地去批判韓粉有將近七八成都是外省人，這件事可能會是大家更關注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網路上有流傳一篇文章叫做：「流浪的宿命」。這個作者他不是講他自己，他講他一個出生眷村的朋友，他用一種問答式、申論的方式，透過這個朋友出生眷村，他告訴我們說眷村的外省人到底為什麼都支持韓國瑜。大概有流浪的宿命，裡面講到很多眷村外省人的心態，他們被國民黨背叛，一輩子都在流浪等等。總之，因為我們缺乏討論，因此直到現在台灣對外省人的形象認知還是非常單一跟僵化。從過去到現在，到底所謂被看見的形象是怎麼樣子，他們是如何被看待或者是看見。

我大概有分三部分，一個是整個社會歷史政治在演變的過程當中，外省人的形象或被談論的方式。另外一種是在學術研究的場域，學者的論述或學者的觀察、結論，也會影響我們社會上去看待外省人，再來是所謂文學、藝術、電影這些文本去呈現的，不管是被呈現或呈現的外省人，我覺得我們的認知大概被這三個面向去交織，形塑了大家腦海中外省人的形象。

基本上我們在談外省人，不管有括號或沒括號，有個共識是指 1945 年到 1955 年前後來自台灣省以外的中國各省的移民。1945 年的剛來是接收的官員，政府、文官體系，49 年以後可能是所謂難民，1950 年代初期還有一些小的戰役，從大城、徽江、舟山群島等來到這邊。外省本來指涉從地理空間來講，因為過去有台灣省這東西，外移台灣是一個省籍跟空間的概念；現在我們會知道，他其實是所謂台灣四大族群當中的一個「族群」概念，所以從空間、省籍到族群有這些變化。

我們現在談族群這個東西，台灣四大族群也是大家共識或認知，這個群族根據，就台灣來說，可能是大家來到台灣時間的先後，或者是有相同或相應的歷史經驗，透過內部成員的自我界定跟外部他者的認可，形塑成某一些我們有共同祖先、來源、文化、語言等等，產生「我群」跟「他群」，自我跟他者想像性的認同。我們也知道族群其實不是一種本質性的，他沒有固定不變，絕對性的文化特徵，可是不可否認，即使你看外省人都來自中國各地不同地方，可是這些，不管是逃難、離家、流散、離散這些相近的歷史遭遇，會強化這個群體間的認同情感，相對來說，台灣本省籍人士也是一樣。所以在 1980 年代本土意識萌芽，本省籍的本土人開始去翻轉，就像剛剛王師遇到的老師，他會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他

們要開始去追求我是誰或台灣人是什麼的時候，我們這群人跟這個來自戰後來到台灣的這群人有很多不一樣的經驗。會意識到我是誰，以及你不是我，因為你跟我不一樣，跟「我」擁有不一樣的歷史經驗跟集體記憶的外省人。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中國的國族主義、中國義理神話崩解的過程，我們會看到本土意識造就了台灣民族主義，這意識講的是說，台灣人在過去幾百年中受到不同外來政權的統治，從來沒有政治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但是現在 80 年代的國民黨也是壓迫台灣人的外來政權，所以呼籲台灣人要站出來對抗外來政權，才能夠當家作主。在這樣欲求、呼籲底下，會看到國民黨是一個壓迫台灣人民的外來政權，跟著國民黨來的這群人當然就不會是被框在台灣人裡面，所以會以所有非外省就是本省的群體的歷史跟文化作為總倡議的重心。這樣來說，無形之中，也會把所有「外省人」，不管性別階級等等，排除於「台灣人」的指稱之外。外省人也糾結在我被排除了？還是我自己排除了？或者是說我不認同台灣？還是我沒被台灣本土認同？這個是一直從 90 年代，作家、很多文化人一直在談的問題，是社會情況上的狀態。

在研究上，我自己會有這樣的觀察，在 1980 年代以前，基本上我們現在談的族群還沒有核心概念。到 1980 年代以後，一開始還是從省籍的角度談省籍不平等，談本省人跟外省人的資源分配，跟政治權力不均等。1992 年很重要的是有一個省籍、族群與國家認同的研討會，大概就是在這個研討會當中，很多學者所發表的論文揭示了這件事情。過去大家可能隱約意識到，外省人自己卻沒有意識到，但本省人意識到省籍之間的差異不平等，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在研討會上，透過學術的認證，政治學、社會學家，透過他們的調查研究去揭露外省人在台灣人口比例雖然很低，12~15%，卻因其族群身分而佔據政治權力及社會文化的優勢地位。學者揭露的這件事情就讓以公平、正義為訴求的反對運動，以此做為訴求社會改革的主張。

當時研究者會談的就是政治權力、社會經濟報酬、族群通婚、不同族群語言位階高低，國語所謂比較高等，閩南語比較低等去進行統計跟描述，這個東西也界定化我們現在會意識到的，國民黨的長期統治造就了一個「階層化」的省籍跟族群的關係。因為這是一刀切的，本省比較低、外省比較高，所以省籍族群內部的差異是存而不論，或者可能有學者觀察到外省族群中的異質性更值得深入探討。可是這不會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因為要談抗爭或者是反對運動、公平正義等等，所以「外省人」的形象就在這個階段同質化或扁平化成所謂的「優勢族群」，大家一講到外省就是「優勢族群」，就是有很高的權力。

這個東西大概到 90 年代以後開始有翻轉，中國文化義理的崩解削弱，挑戰了外省人的優勢地位。比方說，這個最有名就是 1994 年新黨在高雄勞工公園選舉活動被槍聲，說中國豬滾回去的。新黨他們視為，你看外省人都被本省人欺負、被排斥壓迫，再加上當時有很多所謂外省精英政治人物的動員，外省人從這階段開始，他本來是不自覺得優勢，可是透過某種動員跟操作，他變成意識到我們的外省人變成社會的弱勢了。優勢外省人，長久以來外省人在社會佔據優位乃是不公不義的象徵，也是「外來政權」壓迫「本省人」的鐵證。再來就是他的中國國族立場亦不見容於「台灣優先論」的本土意識，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比方說我們說老兵、榮民甚至女性，或是反共義士等等這些差別就被忽略。在這樣的階段，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某些面向爭相強調自己的「弱勢處境」，外省人就說，你們本土派都不認同我們，本省人就說長期以來你們都壓迫我們，這個族群關係的對立是非常尖銳。

我自己認為，在 2004 年「319 槍擊案」的時候，這個總統大選是一個高峰。2004 年出現另外一件事情試圖去緩和、翻轉這種外省族群的污名，就是外省台灣人協會的成立。當時就是一群，比較多是外省第二代的學術社群成員，有感於「社會因為政治衝突而對立分化」，就

成立這個協會。這個協會一開始做的就是一方面解構，一方面以建構，他試圖解構過去大家僵化、僵固的外省人形象，所以他們當時做了工作坊還有口述訪談、生命史料等等，希望避免建立一個完整的『外省人的大敘事』的刻板印象。但這個東西就我剛才講的，到 2009 年就是差不多了。

另外在文學、藝術、影視作品，我們會看到很多作家從不同的角度去書寫，也有本省作家，也會寫到他們跟外省的相處情境等等。接下來我要談的，我選了三個人物，三角臉、劉必稼還有李師科，就是我們說的「榮民」，榮民在當時就是榮譽國民，他們在退除役的時候會領到榮民證。這個證是國家感念他們在抗日、剿匪等等的戰績，會牽扯到 1950 年代的退除役與退輔制度，對退除役軍人進行安置、就養跟就業或者是轉業，看起來是國民政府對外省軍人的恩庇政治或者是照顧，但這個制度是高度階層化。他分化了兩種人口，一種是高階的軍官，就是轉往學校、公營事業、政府機關，可以領取終身俸；可是相對來說低階的士官兵，他們頂多暫時的安置，去參與當時國土開發工程，或者領取少量退伍金之後就自謀生活，或進入東部的農場當場員，再不然就進去榮家，大概是這樣的兩個生命歷程。

第一個人就是三角臉。這個三角臉不是真的人，是出現在陳映真小說〈將軍族〉小說的人物，透過這個敘述我們會知道，他是非常悲慘，後來他跟一個本省籍的女孩子一起自殺。當然從陳映真發表〈將軍族〉的時間（按：1964），其實是因為他已經觀察跟注意到當時低階的士官已經從軍隊進入民間社會，他要強調的就是人道主義關懷，超越省籍、地域、性別，注意到底層者，也為我們塑造了最初跟最典型的外省老兵形象。

李師科是第一個犯下台灣銀行搶劫案的人，是一個轟動當時台灣社會的大事，後來我們發現他是一個老兵，有一些特殊的經歷。老兵退伍之後，他很忠貞愛國，為什麼會這樣？他說因為他看不慣社會上很多暴發戶，當時整個台灣社會在經濟轉型，他覺得國家虧欠他太多，他就想去搶劫，但他不會去搶民眾的錢。因為民眾的錢比較少，公家機關的錢他搶了五百多萬，把四百萬送給一個鄰居，因為他說這個朋友的小孩在唸小學，讓他念書念到大學畢業。這個案件發生之後，當時退輔會的主委說這個李師科是老兵的恥辱，可是當時就有作家李敖，他寫一篇文章〈為老兵李師科喊話〉，我覺得這是在陳映真之後非常注意到或深刻同情到老兵的處境。

最後就是劉必稼，劉必稼他是 1965 年有個紀錄片陳耀圻以他為主角，劉必稼他作為一個典型而善良的中國農民形象是在 1960 年代，可是到 2005 年以後另外一個導演胡台麗用另外一個角度繼續說完了他的故事。最後劉必稼的太太過世之後，中間有這一段對話，剛好可以呼應今天的主題。胡台麗說：所以你變成台灣人了，劉必稼說：對就是變成台灣人了，這個對話基本上是後來引起比較多爭議的。

張茂桂：第三篇論文是由林傳凱博士來和大家分享這也是看不見得看不見，因為到茅坑裡面才發現，茅坑、橫貫公路、榮民之家：重探戰後初期陸軍「白色恐怖」的歷史面貌。傳凱博士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員。

林傳凱：我的論文想處理一個經過六七十年都沒有處理的問題。在過去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整理了目前已知的一萬八千名政治犯相關檔案，統計中發現在 1949 年到 1987 年接受軍閥審判的政治犯中，大概 45% 左右是外省籍的。時至今日 2019 年，在既有的研究跟討論中，大部分是個案會提到，比方說山東流亡學生、雷震的《自由中國》、李敖或柏楊相關的案件。有個問題到今天都沒有好好處理，就是為什麼白色恐怖中，人口比例不高的外省人佔了將近一半？

我想談幾個我在研究時主要的前提，第一個對我來講，至少在戰後初期，外省人不是一個族群。我小的時候，發現國高中很多人沒有聽過鄉音，我還蠻常聽到的，那其實意味著北京話並不是每一個外省人很平等的母語、族群、階級、文化或者是政治經驗。1949年前後來台的120萬左右外省籍人士並不是一個族群，唯一共同經驗就是因為戰爭離散來台灣，這是我第一個前提。

第二件事情是到今天為止的社會結構、社會科學裡面，1949年國府來台之後，在台灣社會重新建立統治，不論是國家再建構或建立統治模式個過程中，絕大部分談的都是這個政權怎麼跟本地社會建立關係。無論它是壓制性，像二二八軍事鎮壓或白色恐怖的內部綏靖，亦或是透過交換利益達成侍從主義的服從模式，對我來講，先不論國際層次，在島內，國府在台灣1949年國家再建構，至少涉及到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跟本地社會建立關係，第二件事情是120位離散者建立起治理關係的問題。我今天要談的也會在這個脈絡下，另外一部分，我有些框架是從博士論文來的。

我的博論是處理台籍政治犯，尤其是1949年到1950年間大宗的地下組織參與者。很多人在1930、40年代成長，日本統治的時候也反紅色跟黑色思想，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戰後為什麼會參加共產黨地下組織？尤其是二三十歲這一代政治認同非常動蕩、不穩定的變遷過程，大家都聽過台灣戰後剛結束、國府剛來，無論是說光復、接受、劫收的一些故事，譬如說在基隆港看到軍人服裝很差，或者是裝什麼水龍頭，相信有很多經驗。但我不太吃那一套，如果你問我那個時候台籍人士在光復紀念的時候，我會先反問你在歷史舞台上這個台灣人舞台的甚麼地位。我意思是，他可能是國營企業的員工、他是地主、佃農，或是他是非常少數大專院學校的學生，他們經歷過的光復是不盡相同的，因為他所在的場域經驗變遷是不同的。同樣的道理，為什麼這麼多外省籍政治犯？我不想談外省是什麼，我要問這個離散者的場域位置會在哪裡？他在陸軍中，底層的？中下階的？高階的陸軍？他歷經過1949也是不盡相同的。

這篇論文想處理的是陸軍底層的士兵。當我們系統性把所有底層陸軍案件拿出來的時候，發現很奇怪的事，有案件是在廁所寫字的。我中間有一部分有比較簡要地去處理，當時陸軍在1949年後的處境變化，陸軍跟空軍海軍比起來有個特色，在對岸的古老中國歷史，陸軍歷史很久，相較於此，海軍跟空軍是比較晚形成，而且海軍跟空軍的訓練門檻其實非常高。但是陸軍就算在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中華民國國府的大定調之下，有大量軍閥、游擊、蘇維埃政府；有地方土匪盜賊，四川的袍哥，乃至於有些地主有徵過補充士兵，就像是大時代的土豪劣紳。在很漫長的時間裡面，決定政治權利大小、政治模式很常是陸戰，空軍、海軍在整體的過程中並不是那麼重要。有些在做政治犯口供，提到陸軍有些戰法，像是鐵肩部隊，那時候未經訓練進去陸軍，有個任務就是把他肩負行李、米糧、設備，甚至有些是拉伕來的，他是被串起來的，我搜集一些照片是拉夫被軍隊強迫做事情的照片。亦或是人海戰術，這個詞其實很常用，人海戰術就是兩軍交戰的時候，未經訓練的平民百姓或是訓練不高的衝鋒兼擋子彈。正規的主力是在第二線，等第一線倒下之後，到敵方前面去。

陸軍跟海軍、空軍很大的不同是，這種作戰方式之下，陸軍需要很龐大的人力，而且成為陸軍的門檻不高，這就是我們常聽說過，那段時間君中常有拉夫，拉人強迫去當兵，包括現在在成大展出的澎湖七一三事件，它也是在澎湖發生的拉夫事件，台灣島那時候也有很多拉夫，那時候的陸軍素質是很參差不齊的，裡面也提到1950年代後美軍顧問團來，說除了孫立人訓練的新兵跟少數軍人之外，基本上作戰能力是非常參差不齊的。可是這群龐大的陸軍，確實是在軍事鬥爭裡面非常重要的軍種，1949年前後來台的120萬名外省人中，根據

歷史學者公告的研究，60萬主要是軍人，其中49萬8千人是陸軍，陸軍比例非常高。但是1949年底國府戰敗，到1950年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之後，陸軍起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最大變化就是，共軍那時候沒有足夠的海軍跟空軍勢力，不可能渡海作戰，這麼龐大的陸軍在台灣成為一個失去戰場的狀態。在失去戰場狀態下，這對國府來講是一個多重的治理難題，包括要養這些陸軍其實很花錢。再來是這些陸軍其實很常跑掉，國民政府到1949年8到11月那三個月份，全台灣抓的跑出來的軍人就有一千多人，之後每一年的省政府市政報告裡面，在三千到一萬人徘徊。對於政府來講，那麼龐大、將近50萬的陸軍要怎麼處理？陸軍軍隊沒有戰場的狀態下，這是當時國府要處理的難題。在制度上，有退除役的輔導制，或是一來台就要做的，乃至1950年代精兵計畫。精兵計畫的目標是希望把平均35-40歲的陸軍降到25-30歲，這個過程裡面有些士兵不斷被淘汰，包括身體不好、年齡太大、不服管教，這不服管教是官方說法，事實上在口述中有提到想家或不想當兵了，各種情況的士兵開始被轉出軍隊。他們被轉到東部開發，有點勞力性質。東部每年洪水、河水、河道是不一定的，基本上部落大部分在鐵路以西的位置，開發的過程通常是山林地方，填土、造土，把土地變成可以耕種。開發農場已經有些傑出研究談過裡面算服勞役的性質，或者榮工處，開始把年紀較輕的軍人轉成當時危險、重大工程的開發人力。除此之外，當時底層士兵的待遇跟醫療照不算好。

這情況下，老蔣來台的前一兩年，就頒布了俗稱禁婚令的相關法令，基本上軍人在營期間不得結婚，三十八歲以下不能結婚，很多過去的說法是怕軍人成家後會影響反共士氣，其實重新來看，更大的考量是財政考量，結婚就有眷屬，眷屬開支是數以倍計的，禁婚令造成當時對陸軍底層士兵來講很苦悶的狀態。我簡單講幾個問題，第一個，1949年前後的撤退中，身為一個陸軍、空軍或海軍，你更不可能把家眷帶過來台灣，如果大家有機會了解空軍或海軍的口述，其實那時候撤退的時候很多是把眷屬送到台灣來，接著你再過來。為什麼？當然是有照顧的成分。更大的，是陸軍跟海軍他們就跑不掉了。

我整理空軍的一章，那每年跑掉的飛機實在太多，很多時候跑回去不是投共而是因為思鄉，但被檢舉為投共。那時候空軍跑的是，每兩個月就有飛機在跑，所以相對於此，陸軍跑不掉嗎？我裡面有訪問過政治犯，在馬祖、金門前線這種情況，想要回家，然後陸軍不會游泳，被判無期徒刑，那時候陸軍到海關來根本跑不掉。撤退過程中，空軍跟海軍較低階的官兵，家人帶過來，但陸軍中下階很多是自己想辦法，當時沒有機會帶家人，你身為一個陸軍中下層的官兵，比例就比較高。

再來禁婚令實行很久，在最近都有一個師大的學生完成碩論，談了軍樂園或特別茶室的形成，那時期單身來台的士兵中就開始出現會跑到民間來騷擾的現象。這個禁婚令當時只有一條路選擇，如果繼續當兵，基本上，不違反軍令的話不能結婚，你要結婚就要離開軍隊。但是身為一個空軍、海軍、陸軍，離開軍隊後生存機會是一樣的嗎？空軍退伍後可以做什麼？民航機駕駛，薪水很好。海軍退伍後可以做什麼？輪機長、輪船漁業。尤其是沒受訓練的步兵，又不同本地人，缺乏社會資源能做什麼？

所以他有個困境是，我如果要活下去、要待軍隊，但我沒有機會。如果我離開軍隊，不要講結婚，自由戀愛也沒有那麼自由，看的是資本。那個困境跟身心是在陸軍的底層的文明中會容易出現的狀況，以前我做訪問的時候有一些東西是我沒有想到的，比如，來台四五年後，每過三節，春節中秋，就有自殺潮、上吊自殺或舉槍自殺，或者有現象是鬼鬧房，不是鬧鬼，就是晚上會在房間哭，這個在我提政治犯進軍人監獄發生過好幾次。這個情況身心狀態下，我先從制度的變遷進一步來談過去白色恐怖一些底層士兵牽涉的案件，我發現某方面

來講，他確實來台後統計時沒有入戶籍軍人也就是外勞，大部分看見的地方就是軍營、榮民之家、榮工處。

但是我發現大部分的軍人，在底層士兵發生案件，有太多是在廁所寫文字被抓，比方說當時芮全定，浙江定海人，陸軍第 7608 通信中心的上士，他在廁所上寫：「推翻國民政府敵蔣介石，他拆散我們的家庭。迫我們拉台，（拉夫來台的意思），害得我們受苦」，被判感訓三年。陸軍一個心理作戰第二中隊的上士照相沖洗士劉振華，1965 年在廁所上寫：「毛澤東殺我父母蔣介石絕我子孫」、「自幼投筆從戎迄今廿餘載，但仍隻身軍旅，真是悲慘至極，怎能不叫人傷心呢？我知道跟我同樣有很多人，只能同酒傷心淚吧，今後祇有苟且時日，來解脫這人生的一環，天知道！」、「蔣介石害世魔王，蔣經國害國總統」，在 1966 判刑 7 年。類似的情況很多，比方說高立福，他 1954 年 1 月 25 日在廁所寫說：「我們士兵的綁腿只有等人民解放軍來解放了，他媽的、他們穿美式大衣、我們布大衣還要四人一件。他們吃火鍋、我們住漏屋、他媽的、什麼國民革命軍、這樣還不垮台、真有鬼呢！」判刑七年。陸軍鄭先貴寫：「陸戰部隊戰士們你們為什麼要被他們關住？官長不能帶頭作用，將你們當作牛馬，然後每日都派甚麼糾察隊來威脅你們，官僚專制，合作社是吃兵血肉的...」判刑七年。

在我論文列的所有案件，我列了二十幾則，這裡面有幾個訊息。我訪談中最想了解的是為什麼是廁所，有些政治犯有給我們解答。去年林孝庭有出一本叫《意外的國度》，可以看到美軍其實有在規劃一些計劃的時候，老蔣反而沒那麼想反共，但是底層的士兵對是不是要打仗感受最明顯。第一個，根本就沒有要打仗，打仗這件事有時候不是對共黨的問題而是回家。再來，家人沒過來，我這邊不能成家，每天都在喊口號感覺非常虛偽。他說：我在上大號的時候覺得我不像個人，我都喊些虛偽的口號，他自慰打手槍也在廁所裡，是軍營少數自由的地方，很多人真的沒想過在裡面寫字會被政風抓到。

他寫的東西是什麼？大部分在抨擊一些事情，家人沒來被拉伕、在台灣絕孫，有個特色其實是軍中崇拜領袖的口號，他們反過來寫，比方說殺蔣拔蔣，然後毛澤東萬歲。我很認真訪問台籍政治犯，我所訪問的台籍政治犯很多人是怎麼讀過一點左翼的小說或論述集的。但這些陸軍來看毛澤東，沒有什麼太多感想，其實連字都不會認。你可以告訴我毛澤東是王八蛋，我看著蔣介石也是王八蛋，所以我要罵你罵毛澤東萬歲，我要講的邏輯不是什麼深刻的政治思想，這是對現實的不滿所迸出。

我第二個部分，再往下案件有寫，是在榮工處案，我發現奇怪的現象。一般我們走中部可能會容易從花蓮上去，我們覺得會是去很多的地方經過的點，但是這其實有政治案件。我在第 184 頁有提到一個案子，就是白慶明遼寧人，他是「韓戰」時的「反共義士」，「反共義士」會一兩年後就編入軍隊，然後一兩年後就叫你除役。然後，他跟另外一個人薛根全，江蘇常熟人，他被編進去退輔會下面的「達見工程隊」，在中橫、達見這邊開路，那段時間其實都沒有發薪資給他們。1961 年的 8 月 16、17 日，中橫完工後，遂在中橫 62K、63K 處，用紅色鉛筆寫：「親愛的榮民同仁，你們太苦了，來愛護毛主席，打倒革命黨」、「告知榮民同仁，親愛的榮民同志們，你們大陸來到台灣，是為了國家，但是現在國家不要你們，叫你們退伍做苦工，有錢得不到，希望愛護毛主席，打倒革命黨。」在法庭上其實法官也知道工資沒發是不對的，但還是用不循正常管道，判他們三年半有期徒刑。

我其實蠻想戳破一個神話，當時的開路其實是許多...包括我訪問榮民政治犯真的是沒得選，因為台灣社會，你退除役之後，找不太到工作，而那個工作根本就沒做安全防護，薪水愛給不給。我也引用到聯合報的報導，今天榮民很多已經是高齡的，中橫一公里平均死一個人，

他們都不到三十歲，不是老人，只是廉價勞動力。開路英雄的口號背後，一方面是生命的犧牲，一方面國家讓這些人做無償勞工，根本就不在乎他們，他們死了之後給他們英雄口號，只是虛偽，而且這些人只是抱怨工資不發就變成政治犯。

再來有些案件發生在什麼地方？榮民之家、榮民醫院。比方說陳精堂，這個人陝西，家中獨子，父母均亡，所以他 1945 年為求生存進入軍隊在南京投考憲兵，但隨即感染疾病。1949 年隨軍隊來台之後得不到好的照顧，被派到日月潭分遣班的營房擔任炊事。因為他實在沒辦法被照顧，健康每況愈下，1954 年 2 月 27 日，他在日月潭附近馬路上寫：「打倒蔣介石」、「消滅蔣匪永過太平洋」。其實在法庭上，判決書上有提到，他久病不癒，精神失常，他在獄中想自殺，雖然被阻止但也沒有坐完就死掉了，他還在基隆醫院住，真的有蠻多軍警政治犯死掉。張永熙，雲南人，他當時也是因為身體不好，被編入「療養分隊」他寫：「我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十分險惡，我們作了國家的工具，而沒有做到人民的武力，我們的生活水準應該向國軍看齊，我們這些被退除役的人」，然後希望總統不要連任，被判刑七年，但不到一年他就因為生病死了。這種案件非常多，很難想像榮民之家或療養之家有這樣的案件。

最後我想放一個，像剛剛前一篇的發表人提到的，像是李師科這樣的人是非常多的。我舉一個黃仁亞的案子，廣東人，他在 1930 年代就進入陸軍，之後隨軍隊遷台，1958 打過「八二三炮戰」，可是隔年它卻被退除役。退除役後他是四十八歲，找不到工作，他只能去新竹的頭前溪採石維生，他睡在防空洞成了「街友」。「八二三炮戰」時，國共軍投過來「心戰傳單」叫《在家鄉過幸福生活》，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黃仁亞把這張帶在身上，但他有時候會拿給身邊做工的工友。有一次他在河邊，剛好三個少年在玩，他把這張紙拿給少年看，少年就去舉發他，所以他被抓起來，被判無期徒刑。其實一個到處住防空洞的退除役士兵，為什麼要抓？對我來講，這是我當時想要解決的心裡的疑惑。

結論的部分簡單講一下，講這些案件的時候，我想講幾個點，第一個是說，在既有社會科學文獻中，經常談到戰後國家所謂的外省人被均質化，建立起侍從主義的關係，一般侍從主義指的是我透過商品、服務交換爭取了政治支持。而在既有的文獻中，最主要的管道其實透過選舉獲得支持，但當時單身軍人有很大程度是兵籍，不落戶籍，他們不能投票。

第二個是從這些案件中，他們的牢騷被控制、被管，空前絕後，待遇差，你很難說這是一個滿足的侍從。1949-1959 年間，省政府每年處理逃出的士兵是三千到一萬人，然後失業者、疾病、甚至是性騷擾或性侵。用最低限度去談，那個叫侍從？如果要談這件事情，不是從侍從來談，是從這些案子來談，他可能不是一個完美的框架。

第二件事情其實我在這個文章裡面這鋪陳的是，到 1950 年代中期之後，軍中的思鄉情緒跟壓力多，一點點的騷動就會引起集體騷動。那個廁所文字，以前台籍政治犯陳英泰先生，他那時候還有說他去綠島坐牢，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些軍人講一句話就被判七年。其實他要放到那個場域看，那時候底層士兵是一個鄉愁壓力，你的家庭不在或無法成家，一兩人的的抱怨很快就會引起迴響。所以對軍方來講，就是要鎮壓掉這些案件，異議之聲千萬不要放出來。

最後我想講的是，我剛剛有提過，我想要場域化來看，這不能解釋所有軍人白色恐怖案件。相對來講，軍事暗殺的串聯行動就會不同，在海軍、空軍其實是有不同的面貌。無論如何對我來講，每一位分享者都有提到外省人不是鐵板。我從場域的路徑來看，他們在戰後 1949 年，大概什麼場域、位置中，制度怎麼變遷，他們的感受是什麼，還有為什麼會變成白色恐怖案件。

張茂桂：我們請王教授評論慶華的論文，然後請許文堂許教授評論林博士的論文。

王健文：我給慶華的第一個建議是，其實後面三個故事是很動人的，應該把 25 分鐘至少 20 分鐘來講故事，前面這些大家翻一翻論文就可以。今天三位有兩位談外省第一代，都是屬於社會底層的外省人，會聚焦在社會底層的外省人是有特別意義的，是要打破外省人是權貴，或他跟黨國體制的共生的群體這樣一個刻板印象。高格孚教授做了生命史的訪談是一個第三代，外省第二代的作家駱以軍曾經寫過一句我覺得很有意思的話，他說「是什麼原因，我們必須要假裝在這島上出生，而其實我本就是在這島上出生。」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自己把他稱為駱以軍提問，駱以軍作為一個外省第二代在台灣出生，他卻必須不斷跟別人說明我是台灣人，對方不見得相信，於是就好像他假裝他在這個島上出生。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說明？這兩天許多的主題都很有意思，呈現一個複數的台灣人的概念，有各種各樣不同背景、來源、出身，不同歷史面的人，我們都把他納入到這個研討會的討論。我們看到離開台灣幾十年的澳洲台僑或是北美的台灣人，絲毫不會去懷疑他就是台灣人；我們會擁抱在殖民時期出生的灣生，不管他是戰後多半都回到了他的祖籍，我們很樂意他成為台灣人；我們社會也漸漸學習主動張開雙手，去邀請從東南亞、印尼、越南來到台灣的朋友，希望你們也是台灣人，事實上你就是。

很有趣的是，許多以前在台灣生活的，60 年、70 年的外省一代，他常常還是要被質疑說，你是不是台灣人，你必須要提出什麼樣的，表現怎樣的姿態出來，我們才承認你是一個台灣人？我覺得外省人在台灣，其後的七十年把它放在最後一個是一個有趣的安排。回到慶華的文章本身，這基本上是一篇有點哀傷的書寫，他的哀傷除了表現在小說人物三角臉、1982 年因為搶銀行被槍決的李師科，以及劉必稼這三個哀傷的外省老人的故事之外，雖然這些故事在發生的時候他們不見得已經年老，另外一個哀傷可能慶華有談到，他覺得 2009 年的時候大家會熱切去關注外省跟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群體的存在，他們會關心他們的命運、各種悲歡離合，可是到 2019 年的時候，讓人家揣測可能的原因，卻沒有得到同樣的重視。

可能更哀傷的在這篇文章談到，劉必稼前後隔了幾十年，兩位導演分別拍他作為紀錄片的主角，1965 年的陳耀圻以及 2004 年的時候胡台麗，胡台麗在對劉必稼做紀錄，談到最終的歸宿的時候，紀錄片導演有點刻意有意識地介入，希望為劉必稼取得一個最終能夠安身立命的群體，就是台灣人。但是劉必稼看起來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也不做可能的辯駁，也許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慶華在文章的最後提到說，真的是這樣子嗎？他真的就得到安頓嗎？幾十年前離家漂泊的一個心靈，其實恐怕是有永恆的哀傷，沒有辦法真的找到一個安身之地。所以我剛在一兩分鐘很快提一下，今天的這幾篇文章都會去談到，包括這個會議呈現的是一個複數台灣人概念。今天大家也在談複數外省人的概念，特別是策略性地從引起大家同情的策略底層的外省人，希望去破除他們一開始談的刻板印象。

但是慶華文章裡面談到 2016 年的時候一位自稱公民記者的洪小姐，他在高雄羞辱一位外省老兵，因為這位外省老兵是社會的弱勢者，所以得到台灣社會不分藍綠、不分政治立場普遍的同情跟對這位洪小姐的批評。但是就在前兩年，2014 年，318 在立法院的外面，有學生指著馬英九的人像說支那賤畜、外來種滾，我卻沒有看到這樣對外省人的羞辱，得到社會一個比較普遍對的批判。我也會很好奇，比方說王師的父母親所呈現那樣子，如果也受到類似否定性、羞辱性的東西，我們到底怎麼去看待？

但我們承繼一個複數外省人的概念，特別去談到他其中一個可以受到更多同情的某一階層的外省人之後，我們是不是很有可能忽略了，在不同場域裡頭來到或者生活在台灣的外省人，

他們是不是有些共同特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但是包括馬英九、包括王師的父母親、阿公阿嬤、李師科、劉必稼，他們都有些特質，這些特質是什麼東西，也許是我們進一步去追問的。

許文堂：林傳凱一向資料豐富，敘述的故事非常精彩，而且有趙慶華教授、高格孚教授兩篇關於外省人的討論，替他鋪陳非常好的背景。我們這一個研討會是說要成為台灣人，tsiänn 作台灣人，to be Taiwanese，但是這一節我們所討論的外省人的遷台，恰恰好是在講 1949 年以後一直到 1990 年，所有的人被教育成 not to be Taiwanese，大家都是中國人。在這個情況之下，尤其是蔣介石在遷台以後的：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各位要注意到，他所提的四十四個案件、十二個訪問，這些所謂陸軍底層人物，都是在最初期的，這些人是沒有退伍期限的。也就是說除非你傷殘、完全不適任當兵，你才會被剔除。我們從他研究的場域來看，非常有意思，一直到我當兵，甚至在學校有所謂的廁所文學，廁所裡面寫滿各式各樣的文字。但傳凱提的這些，卻是一字千金，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這是戒嚴條例第六條、第七條，都是七年起跳，但可能傳凱沒有注意到，更多的人是二條一、二條二，判得更重。

從這四個社會場域來看，非常有意思，可能我們一般人不會在那裡出現，廁所、工地、醫院，所以從傳凱的切入點我們可以看到，特別的、不是政治化，私人的抗爭手段。但是我要提醒，檔案是不是都真的？如果檔案都是真的，那就沒有冤案了。我們看到很多政治案件根本就是屈打成招，剛剛有提到恩庇侍從的問題，只要順從你才有恩庇，不順從就不會有恩庇，這是很弔詭的事情。我當然都非常同意林博士整個敘述，但是因為是量化的研究，我們做史學的人看起來會有不太一樣的角度，有一些敘事比較失真。譬如說大量的逃兵問題，當時為什麼是省政府的系統來做這個統計，而不是憲兵系統來做這個統計？或者是說，在敘述蔣介石，原來這個地方不是台灣，而是雲南。雲南，他應該就想到了，他當年去把農民弄掉的時候，盧漢看在眼裡，他現在要派蔣經國找盧漢談的時候，蔣經國差一點就被扣起來了。這種敘述方式有點覺得你的故事說得很好聽，但是好像缺乏背後交代一下，對於這些底層的外省人來講覺得他們是在坐牢，但其實對台灣人來講，一樣是在坐牢，因為四面都是海，同樣面對那個政府。

張茂桂：因為許文堂講到，柯旗化也寫到一篇他的回憶錄，不過傳凱應該是在講對那個當事人來講那個處境的感受，不是在說族群之間誰比較苦的對照。外省人的議題如同剛才趙慶華所說的，大概 2009 年以後我就不太想再碰了，這裡面有非常多複雜、社會公平正義不是那麼清楚的議題。我們過去在做這種族群議題研究，常常會用二元論，壓迫者跟被壓迫者、台灣人跟非台灣人，如果不是的話，就變成台灣人。不久以前我也想到另外一個政治不正確的事情：重新學習成為中國人。無論如何在結構性二元對立下，我們處理個案、歷史公平正義的時候會產生很多焦慮跟壓力，這是我的概括，09 年之後好像就不太處理外省議題的原因。

回到今天 Stephanc（高格孚）文章的評論，Stephanc 還是處於訪問稿，因為受訪者願意分享再加上 Stephanc 本身的洞察力，我覺得這是很有潛力的寫作，可以繼續發展。他說了一件事情就是，有眷村背景在天龍國大安區長大，有文化優越感的人他如何看待台灣、他如何轉變？他承認他文化的優越感，這讓我聯想到以前很多人對於民進黨的印象穿拖鞋吃檳榔，也是被壓抑的、很低的想法，因此這個文章就從優勢者的轉變切入。我聯想到另外一個不轉變就是郭冠英，眷村長大，故意說你們是台巴子，我是優勢者，我代表共產黨，可以看出來這個對戰，Stephanc 的評述分析還沒開始，但在結論已經有些暗示了。就是從一個人來說，他非常孝順，對父母親非常順從，有拉扯，可是碰到安全問題的時候他有務實，我們可以說他

是不支持台獨的新台灣人。但有可能 life history 寫下去還會變，他在高中的時候他是新黨，是一個高度動員的狀態。但太陽花之後，他看《牽阮的手》，他改變了。無論如何，他可能是處於變動，這個問題再繼續往下延伸，就是有沒有認同的問題，可以不斷去追。

我會建議他既然這麼看重家庭，他的父母需要也了解，他的 life history 決定不是他自己而已，而是他的家庭、父母還有兄弟姊妹、配偶，不然那個故事是不準確的。你的意見裡面，也有個跟另外兩篇文章也很有關係的意見，就是傳凱所說的場域。其實他的工作跟職業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個攝影，我不清楚他是紀錄片的導演還是宣傳者，但他的職業這件事感覺是需要非常大 empathy（同情），才能跟觀眾溝通。否則作為一個 film maker，沒有 empathy，講不出故事來，而他看到田媽媽、電影會哭，也是一樣的。總之他職業、工作特性也許是可以切入的地方。

因王教授已經幫我做了很多鋪陳，我就簡單地說。外省人是不是一個族群？這問題可以討論很多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問題。可以感覺到，他是從社會經驗調查分析類屬，變成一個族群的政治論述的過程。因為先做調查，把家庭背景當成族群背景、社會階層化的研究對象，變成一個政治論述，就會出現很多外省人問題。那個外省人到底是什麼？仍然是要問的問題。王教授說，你們也是外省人，但是不見得台灣人就是本省人，有沒有一個共同性才是問題。

傳凱說我不要做外省人，我不是在講外省人，但是無論如何他就是一個參考點，這是因為有過去很難改變的歷史結構，但作為參考點，也不適合作為分析的終點，也就是說不能得出結論說：外省人就是這樣。他可以是一個過程，反過來說，這個研討會在做的也是一個過程，「成為台灣人」是過程，我也在想，外省人也可能有人被喚醒強烈認同。在政治的這個初犢裡面，他突然強烈關心，認同是什麼？這仍然是重要議題，傳凱用不同場域去試圖解構認同問題，他是在情境、條件、工作環境、政治壓力下，我想可能是存在的。反抗的行為選擇都有個朝向合理化，朝向平和價值觀。只是如果方向如果不一樣，就會有認同的衝突。裡面也有很多情境，今天可能不適合再討論。傳凱有說到陸軍的特性，過去在討論軍眷、老外省軍人職業時，比較沒有凸顯陸軍。不過我會說失去戰場這件事，你用得太快，當時沒有失去戰場，外島兵有三分之一的陸軍在那邊，所以他不是失去，是三分之一在外島。

劉必稼的故事他不是被抓伏來的，他是他們家鄉要出壯丁，他就來了，他算低階士官兵裡面還算不錯的，他不是因為頑劣份子。我跟傳凱的觀點不太一樣，國民黨根本不是要治理他們，國民黨只是要治理頑劣份子，根本沒有想到這些離散的人有什麼情感因素、生命因素，他覺得是你的問題，非把你從軍隊裡當毒瘤一樣割除掉。政府其實沒有治理的概念，只是要不要建立軍隊的權威而已，寫到那個軍隊槍頭的壓力鍋，我覺得這是很有發揮的潛力。過去我們也做過榮民返鄉運動等等，但對於當時實際的狀況跟理解是相對不夠的，無論如何，謝謝五位，我今天來此都覺得收穫很多，又煽起了一些我想去做外省人參考的東西。

提問時間

觀眾 A：我的問題是向高格孚教授提問的，我有看過你的書，我大概在三年前開始做台灣認同研究方面的問題。你做為一個法國人，你是非台灣、也非中國，會覺得非常客觀公正。你採用的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受訪對象代表是外省第三代，你在這個討論或學術發表會受到質疑說，這反而太典型了，沒有代表說最普遍的在台灣生活的外省三代一個分析。這也是我的困惑，我是來自中國的學者，我在美國發表研究的時候我也是採用生活史，也會受到質疑說，你這樣採用一個田野報告人，他的生活史的狀況有沒有代表所有中國農民生活的形象。我想今天你同樣的研究方法所以我很想請教，謝謝。

觀眾 B：我想問三位學者，我算是台灣文學背景，我們都會知道書寫要一定的社經條件，剛好三位學者聚焦的外省人代表場域可能不一樣。我想問就是從外省在台灣文學裡面，像是白先勇他會寫不同階層的外省人，會不會仍然有作家本身條件的侷限，導致於剛剛林教授提到的，政治犯的陸軍經驗其實是完全無法被涵蓋到所謂眷村或者外省文學裡面的？

觀眾 C：三位都是非常精彩的論述。我的問題比較接續到剛才在討論外省人的性質，主要是針對林傳凱的研究，林傳凱的研究真的是很實在地看出很多現象，後來會接續到現在韓粉現象都是有可能的。只是說在最早的時候，你提出的問題、架構裡面，你的設定是說這樣還稱他們為是外省人，你一開始說他們百分之 49 是外省人，所以這個會使我們把詞彙再作清楚的界定，這樣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會比較好。

你說用離散者會比較好，可是離散者的話有各種類型。我倒覺得說當時來台灣的，就是敗軍跟難民，就是這兩個性質。當你在看他的政治裡面，茅坑裡面寫的東西跟被抓跟他是不是外省人沒有關係，是軍隊裡面的服不服從的問題，所以這裡面被抓、受迫害的理由不在於他是中國外省人，但是這個性質就跟非這種類型的台灣人政治犯不同。「我不是中國人」這句話可能就得到一個罪名，所以這裡面的族群要素，要在比較後期才發現，這個外省人的名詞。比如，我們 2000 年在寫台北市史時候，我們要寫台北市族群的時候，族群專家裡面要寫外省人，但他一直都不敢寫說我們是不是叫外省人，甚至馬英九說叫我外省人會覺得怪怪的，因為當時就跟許文堂先生講的，就叫中國人啊！為什麼要叫外省人呢？。所以，在族群的意義上，我們現在必須去區分他，現在叫外省人，但當時就不叫外省人。而你講的離散者，1949 年之前來有可能想做生意，有可能是中國混不下去過來的，這種比較普通的移民也有，49 年之後來的應該就是敗軍、難民，他們被捲入這樣的政治事件裡面，不是因為他是外省人，而是因為他是軍隊結構裡的人。

林傳凱：我就把剛剛的問題簡要回應一下。為什麼是省府，應該是警務機構做的統計，他每年會對兵籍、戶籍跟治安做分類，他們也會分析這群人數量多少。然後，關於是不是冤枉這件事，這十年我們在努力一件事，本省政治犯 98 年作法，因補償條例規定假錯案有補償對象，但，在這十年間，口述起變化很大...我意思是說，一個是我沒有做官方說的合作，一個是我有做我也不該有罪。其實這裡面有很多人是我訪問的時候就已經不在，他們年紀非常大，其實那時除了筆錄、自白等之外，我敢引用的大多是這些同房提過的，但，這是很間接的證據，基本上已經過世或很高齡的政治犯我們能判斷的依據很少。

再來是剛剛老師提到說我不談認同，我不是不談認同，而是說在 1949 年後有一段不是族群化的認同，我談的是離開家，或無法成家，那個婚家的部分，其實都跟認同有關，不一定是族群認同。所以我有一章談婚家結構的困境或狀態，然後，在這程度上我確實對戰後初期那段時間，我不認為外省人這個群體，它可能是參照點，相對來講那個成不成家的問題對他們困難曉很多，他們不像底層陸軍，成家是有些結構性的限制所造成的。

那個失去戰場講起來真的有點快，不過我剛在馬祖結束了工作，加上我特別把馬祖政治犯的部分...我有找當事人一起過去，當時還是有很大的感受是，隔著那個海每天打那個宣傳單或是步兵打砲戰，這跟他們在大陸的作戰經驗其實已經不同。他其實現在還住在彰化，當時是真的想要跑回去，他是想家，我覺得那個情況，那個戰場 1949 年確實已經轉變，而，那個在前線不知錯的狀態，對這些軍人是存在的。

趙慶華：你(觀眾)問的問題是說外省人文學是不是會受限於作家個人的經驗，以至於沒有辦法很全面地展現外省人的面貌，是這樣的意思嗎？確實有可能，比方說我們在談眷村文學，大部分是有眷村經驗的作家會書寫他們自己經驗過的東西。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或者是過去的一些檔案、歷史紀錄等等，這些東西出現以後，還是無形中會擴大作家書寫的題材，現在陳雪也會去寫家族白色恐怖的經驗。像白先勇的《台北人》，他從高層到低層都寫都關照到了，有時候還是看作家個人的視野以及他們自己的關懷。

高格孚：你(觀眾)的問題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沒有一定的答案。這三個問題主要是真實性，其實這樣的字是帶來很多麻煩。第一，我很難確定什麼 **authentic**。你的問題很難回答，一個人的生活、認同、故事是不斷地在改變，這是事實，不代表說他的不是 **authentic**，如果 **authentic** 是 **correct, truth...**，這題的問題重點是，我選了一個生活史的研究方式，就是因為我認為這個人沒有任何代表性，他只能代表自己，就是生活史的出發點。

張茂桂：我們研討會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仕淵：非常感謝這兩天來參與，特別是在最後一場還有很多的朋友對這個議題關注，成大人社中心對這個議題所談的，會是我們長期經營，也不只是這一次而已。我想在未來我們期待就這個議題再持續對話下去，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活動的參加。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